

我的父亲母亲

□ 戴敏

我的家乡在大港一个叫做湾戴的村庄,父母都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

那个年代每户人家孩子都多,很多孩子都是勉强上学识几个字就辍学务农,而我的父母都考上了当时的县重点大港中学读初中,母亲说她在上初中时就听说过父亲。由于母亲是家中的老大,后面的孩子陆续出生后,家里劳动力少负担重,承担不起她上学,初中仅上了一年就辍学回家,母亲说她为此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次。

这大概也是那个年代千万家庭的状态,孩子多,生存压力大,就算能考上学校,家里也供不起。

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完成初中学业后,回村里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是有点“墨水”的人。回到生产队里后,因为人忠厚、做事踏实,被一个大队干部看中,这个大队干部个子特别高,我小时候只知道喊“高爷爷”,“高爷爷”重点培养父亲,父亲在26岁时就当上生产队长并光荣加入党组织。

从那时起,父亲就带领着湾戴村的社员们进行劳作,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组织生产劳动,完成上缴公粮、兴修水利等各种任务。白天他一样跟队里的社员上工,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当天上工社员的名字、大小工种合多少工分记录在案,作为年底社员们统计工分、分配粮油的凭据。父亲虽然个子不高,但他做事遵照“高爷爷”的教导,不管是平时生产队里出工,还是冬季农闲时公社组织到南京秦淮河、大港掘山河出水利,都按时处处带头,从不偷懒。

“上工如拉纤,下工如射箭”,这个顺口溜说的是在大集体的时代,生产队要组织社员出工的难度。但父亲所在的生产队,由于父亲事事带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据父亲说,当时队里的社员有一百多人,由于队里工种不同,同样是一天,但工分是根据劳动强度来定的,调皮的不能让他讨到便宜,老实的不能让他吃亏,做什么事情都要一碗水端平,这样大家都服气。

父亲毕业后回到家里参加生产劳动时,母亲已经先一步辍学回家。她参加生产劳动时只有15岁左右,但不畏难,不怕苦,处处争先,说冬天村里组织从唐家湾的山上挑石头回队里做水利,她挑回的石头称重后,不比男社员少。

在几年的劳动实践中,父亲当上生产队长,母亲是公社、村里社教宣传队的活跃分子。在日常接触中,年轻的他们心中种下了爱情的种子,那个年代结婚大多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母亲常说他们是自由恋爱,是双向选择、双向奔赴的结果。

父母一辈子养育了三个孩子,母亲说结婚后时间不长,爷爷奶奶就跟他分了家,他们只分到两间五架梁的房子(当时农村大点的房子是七架梁的),一开始大人小孩五个人都睡在一张床上。

分家后,母亲起早摸黑地折腾队里分到的一些边角地块,或者到山上去开荒种点南瓜、山芋等杂粮贴补家里不足的口粮,那个年代的人大多有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饿肚子的经历,所以母亲常说天好要防天阴,平时要多做些积累,不能浪费。

父亲在生产队长岗位上干了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后来就到大队去工作了,父亲经过生产队长岗位的多年锻炼,劳动生产、群众矛盾调解方面都是一把好手。小时候我也经常听到父亲在村里大喇叭里交代村民什么时间要治虫打药,以及传达公社相关会议的精神。母亲说起父亲当时的情况也是一脸的自豪。

因为有三个孩子要抚养,要解决孩子大了居住的问题,父亲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为了增加点收入,开始养老母猪作为副业。养老母猪是个苦差事,一是一窝小猪从生下来到两三个月大需要吃大量的饲料,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小猪在生长过程中会生病,而且会相互传染,一旦没治好可能就是白忙活半年。我小时候就经常跟着父亲起个大早,把小猪崽放在板车上的猪笼里,拖着走一两个小时,拉去丹阳埭城、大港街上的集市去卖。

村里邻居有的人家比较困难,想养头母猪但又没有买苗猪的钱,父亲会让他们把小猪赊账先拿回去喂养,等年底宰杀后再给苗猪的钱。

靠着父母的辛勤劳动付出,家里后来又盖起了三间大瓦房、两间厢房,还围了一个大院子,大瓦房的中间客厅做了好看又耐磨的水磨花石子地。

父母很重视子女教育,我们兄妹三人中,我和哥哥都上到高中毕业,妹妹也上到初中毕业。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多的,现在回头去看,父母为了我们三个孩子的读书真是拼尽了全力。

在那个年代,虽然当时生活艰苦,但父母从来没有让我们兄妹三个饿着、冻着,过年都为我们兄妹三人准备新衣服新鞋子。我高三那年在学校附近的港口职工宿舍住过一段时间,那一年腊月的一个晚上,家里炖了猪蹄汤,晚上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母亲送点汤到我住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里,听到长长的过道上妈妈喊我小名的声音,意外惊喜的同时,内心更多的是深深的不安,感觉自己的学习成绩有负父母的期望。

高中毕业后,我跟父亲提出去当兵。爷爷对我当兵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当兵没什么前途,但我的愿望得到了父亲支持。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父亲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党员、村干部的家国情怀,我也顺利地走上跨入军营,考上军校,在部队工作19年的军旅生活。

一转眼父亲80岁了,我们祝愿他活到100岁,他笑着说:不是想活多少岁就能活多少岁的,过好每一天就行。最近,我们帮父亲注册了个微信号拉了个家人群,他闲时刷刷抖音、看看短视频,经常一个人咯咯地笑。

父母在十多年年前,按照政策购买了养老保险,现在按月会领到一笔退休金,父亲还有一些村干部补贴。他们常说现在的好日子在过去是做梦都不敢想的,跟我们说,做人做事千万不能忘本,要永远跟党走。

历经150年的光阴腌制和岁月洗涤,长江北岸的“江上盐都”会呈现怎样的现实滋味?

初夏的仪征滨江小镇十二圩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清晨,本地老食客径直前往百年老字号迎春饭店,一碗鱼汤面,三四只蒸饺,已足够把一天生活的富足填满胃里。与此同时,数千名外来务工人员,操着贵州、江西、四川、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多省口音,从周边村庄成群般飞向同一地点——招商局造船基地。不久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容纳7000辆小汽车的滚装货船正是从这里驶向海洋。

去年的10月15日,是晚清中国最大的食盐转运中心、两淮盐务总栈设栈十二圩150周年。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开始,两平方公里的小小江村,开始了10亿斤准盐的囤积和分流,一个全新的枢纽链接起临海的两淮盐场、千年的江河水道和“扬子四岸”(湘鄂赣皖)销区,弹丸之地维系的是国家一半的食盐运输和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庚子赔款和政府外债担保的也是盐税,主权旁落,准盐更咸。因而192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世界地图上赫然可见十二圩,虽然是十二圩人的自豪,却又是一个民族的隐疾和羞耻。

十二圩,一粒盐,左右了一个多甲子的国家宏大叙事,幕后导演和编剧非同小可。其实,提及曾国藩,李鸿章就不会奇怪,消灭朝廷心腹大患太平军,湘、淮地方嫡系功不可没,他们由此获得了饷盐经营专利。在原先的准盐转运中心面临塌江威胁后,时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曾国藩沿江考察,选新址,他的目光落在了十数公里外的十二圩。这里江岸稳定、腹地宽广,洲渚遮风、回旋自如。

一种以家族、亲缘为主体的权力设计和以乡帮、地缘为主体的团队组建。扬子总栈栈长(总办)历任12人,绝大多数由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宠臣、直属担任。

其时,由湘、淮两军势力主导的治理模式,很容易将两平方公里的区域划成“九宫格”,十八帮群落有序落子。江淮盐船作业区,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沿江销区的专属码头依次排开,近30个泊位直通江心。江岸商贸生活区,五华里长街按帮分割成九街十八巷,彼此之间设立了圈门和界碑。500多家商铺、店家联袂成市,江北最早的发电厂、电话电报局、照相馆、文明剧院、报馆错落其间;准盐总栈兴办的新式学校、官医局,还有洋人经营的大英、南洋烟草公司,德士古、壳牌煤油公司等纷纷登岸,从江上吹来了阵阵浓郁的海味气息。位于更高处的浦栈管理区,则是188间屋宇围合的盐运总栈机构,曾国藩手书“东南利溥”高悬正门之上,300多亩、可容10亿斤的储运堆场,在一个隐形而庞大的管理体系下高效地运转。只要天气正常,每天清晨都能听到总栈准点发出的“轰轰”炮响,看见一面白底蓝字的“盐”旗高高升起,这是统一上工作息的信号。十二圩,是一个“生下来就会走,走起来就会奔”的神奇小镇,很快成就了一个近20万移民集聚、万花筒般光怪陆离的“经济特区”。

盐,对于商人是甜蜜,对于百姓却是苦涩。在十二圩,要找上一份能糊口的活计并不容易。每逢雨雪盐运停工,十二圩街头就有慈善机构支起粥摊布席,救济饥俄苦人。如果遇上几天失业,便会陷入“早上像浪子,晚上像花子”的窘境。张治中将军在他的回

忆录中,追忆自己两次在十二圩求职流浪的经历:第一次投奔一个远房亲戚,报考随营学堂未遂,受尽了冷落,无奈而返;第二次,只谋得了无饷可领的“备补兵”,有一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将汗褂子当给盛怀宣家族开设的典当行,才有了四毛钱,维持那无情的伙食圈子。而对于只要能“活”就不问手段的草民而言,囤存的利器直接来自拳头、刀刀乃至用盐腌制对手。民间一直有“十二圩人厉害”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更加流传:十二圩人,有血性。

鸦片战争后,大英帝国的军舰开进了长江水道,横冲直撞,在进攻镇江时,却受到了江北十二圩老河影一带盐民的背后袭击,他们用小船装满芦苇、干草,浇上桐油,顺风而下撞击敌舰,结果深夜招致了炮轰报复,连片棚户、数千民众陷火海,“老河影惨案”写入了历史。同样悲壮的一幕,再现于1937年,日寇的军舰驶入江心,为阻止其西进,十二圩两百多艘百吨以上、维系千人民生活的盐船出征,从江南装上石块和水泥,开往江阴要塞,沉入江心。十二圩看似幸运,从同治到20世纪30年代末,却是天灾、兵燹、人祸频仍。随着江泓偏离,沙滩滩涨,那些从海上进来的千吨以上轮船已无法就近靠岸,加之实施由盐场到销场直运新盐法,天时、地利、人和皆失。大船的远去,意味着十二圩千帆垂落、紫盛凋零。

跨越150年,再见十二圩,所见所闻必是另一副容颜,另一种腔调。由北面的沿江公路人口进来,沿途就是仪扬运河连接的盐河,是盐河贯通的盐塘,是盐塘直达的长江。用“盐”命名、经过修缮的旧时遗存聚合成群:两

淮盐务总栈、盐塘码头、盐宗胶鬲祠、江上盐都盐运文化馆、廉风盐韵陈列馆、名人印记馆、仪征共产党组织诞生地、扬子影像老照片馆、黄质夫乡村教育史迹陈列馆、扬子书院……吹在脸上的风不咸不淡;参观游览的足迹不疾不徐。眼光探照岁月深处,看得分明,有些根脉从未离去。

2023年,恰逢十二圩设立两淮盐务总栈150年,小镇扛回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金字招牌。完全有理由策划一场有声有色的生日盛典,但是没有,连一条过街横幅都没有,一块显赫的大屏广告都没有……习惯于沉潜、低调的十二圩献给时代的一份礼物是大船的远征。李鸿章不会想到,150年前自己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现在旗下拥有的世界最大的滚装船制造基地,就落户于十二圩;另一种同样关乎国家经济血脉和百姓生活的“食盐”,再次在十二圩集聚、分流,它就是无所不在、无时不用的大数据,腾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三大巨头的长三角、华东地区的区域大数据服务中心都设在十二圩。寿星的生日需要仪式感的盛宴,需要子孙绕膝的家庭团聚,150岁的十二圩不需要,它只要一块已经咀嚼百年、仍然叫响沿江车站、码头的茶干就行;它只要一碗到了双休日,总要来百年老店排队等候的鱼汤面就行。十二圩人知道,“长江三鲜”的鲜美,来自它从咸涩的大海向长江的逆流洄游,历经千难万险的“马拉松”,才能实现身体的“脱盐”重生和繁衍未来。烟火气渐盛、天气渐足、人气渐旺的十二圩何尝不是这样。

跑马溜溜的山哟

□ 刘玉宝

风从云,云从影,影动心动,心动志从,从啥?还是遛山。这次是跑马山,跑马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就把我的魂勾住了,像有一座富矿等着我去挖。挖呀挖呀挖,从西南头上去一直挖到西北角,还真挖着了宝,这宝不只是那漫山的绿树和纯净的山风,还有那美丽动人的传说,美了我的心。

跑马山坐落在镇江老城区西南隅,南临沪宁线,北眺长江流,西面是光华社区,东面是二道巷社区,就像这里的居民一样,跑马山也质朴得少见经传,只是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城市中间,默默沉淀着这个小城的灵气,抚慰着平凡人的心。

我登山的时候是傍晚时分。斜阳正挂在大江上,整个城市氤氲着迷蒙,踩着落叶铺就的石阶拾级而上,竟然也没遇上几个游人,独自悠悠然倒像是在闲庭信步。初夏时光,花虽然谢的多,却有正怒放的。鸢尾花就是,还有金盏菊,还有不知名的小花,点缀在草色之间,尤其显得出类拔萃。鸟鸣自然是不歇的,三两声仿佛又是在呼朋唤友。落日绮霞,一点飞鸿影下。非藕花深处,是哪里唐突了呢?

顺着弯弯的山路,我没有上去倒又往下走了,指示牌显示那边有观景台。走着走着又觉得错了,再下去竟然是一个广场,有位阿姨在健身,显得有点孤独。我想这也就是境界,比那些扑在麻将桌上的不知好多少倍。我突然想起社区居民的介绍,这里原来大概是有温泉的,温泉不大,却用之不竭,一年四季水温都保持在二三十摄氏度,常年滋润着那里的村民。只可惜后来勘探断了泉脉,也就消失了,最终被填埋于地下,千年万年后,还有谁会记得?

回头,继续爬山。走不多远遇一凉亭,匾额上写着“稼轩亭”,是王明龙老师题的,两边一副楹联:“剪绿春水,的卢不洗旧槽槽;弓月秋霜,龙匣难消挂壁鸣”。不知出自何人,不管怎样倒让我联想到跑马山的来历了,即便不是的卢纵处,估计与三国多少也脱不了关系,因为山下有处地名曹操湾,且不说真假莫辨,现如今那里改叫曹湾湾了。据当地年纪大的居民说,山上确实养过马。估计最早应该就是东吴,有人说清兵曾在山上练马,也有人说是日本人,不管怎么说跑马山是真的适宜养马。山下深塘浅池,山上丰草宽敞,绝对是驯养马匹的好地方。不过如今跑马山建成了公园,早已是附近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继续往山上走,就看见锻炼的人了,透着晚照的地方,人也都镀层金,说是金人穿着却是花花绿绿,有打扮入时的少女头戴戴着耳机在漫步,一个人也演绎着金色的浪漫。这让我更加相信了平安社区的说法,这还不宜居?即便是山里也是太平的。没有阳光的地方也印着斑驳,像蜡染一般诱人。四面望去,郁郁葱葱中楼宇都成了幕布,只等天黑刹那秀灯光,那时的跑马山想必会和城市一起淹没在灯海里。

快到山顶了,又有一座亭——“法仪亭”,“法仪”大致出自墨子,“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这是讲要守法,亭旁的对联印证我所言非虚:“怀揣明月咏虚心翠竹,笔蘸清风写傲骨红梅”。啧啧,多高雅脱俗,真不愧是文化名城,文士雅兴遍举,铸成小城的风骨。山上像这样的亭子还有几座,像山间的棋子,散落在跑马山各个角落,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最好下场小雨,就亭中小坐听雨,妙韵自成。

斑驳的阳光还洒在草地上依依不肯离去,给小草染上了一层橘红色。绿树呢,逆光里被镀上了一层金,从上到下像披上了金甲,护卫着山峰。日头越来越低了,阳光渐渐地躲进了远方的雾霭,又似乎还有留恋,竟变幻成晚霞横空出世,把整个天空弄成了一幅画,让人看不够。那一刻,不知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陶醉在这样的晚景里。

跟着城市的灯火就如期而至,似星光般璀璨。跑马山也由绿玉变成了墨玉,诱惑也越发不可收。丛林间鸟声歇了,人声涌上来,一浪一浪如潮水一般,形成了跑马山独有的节奏。伴随鼎沸的人声,还有那种舒心、爽朗的笑声,弥漫在整个山间,从一个山脊到又一个山脊,大家都被感染着,此起彼伏成了跑马山的夜声晚唱。真的,要我说这就是镇江城的旋律,居民发自内心的无忧无虑增添花式的礼赞,是献给跑马山的,也是献给镇江这座优美小城的。不是说跑马山是座诗山吗?这才是她最优美的诗啊!



留住春天
徐群摄

邱宁阿姨

□ 阿泰

一别20多年后,在水果湖地铁站D出口,终于又见到邱宁阿姨。

大雨中,她和九龄叔打着伞,一眼就认出我,远远的笑意盈盈,一如近50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当年,她就是母亲单位最爱笑的同事,胖胖的,身手矫健,人称“邱胖胖”,和母亲亦徒亦友。

母亲特别喜欢聪明而和善的邱宁阿姨,做衣服、做手工,几乎样样都“蛮灵格”。大概1977年的时候,为了治好我坐不住的“猴”劲,母亲和邱宁阿姨亲手制作了一款玩具:找来木做框,做好槽,做成四分厚、书本大小的盒子。共三层,底层是暗箱,第二层是五夹板,除去右上角,其余三个角有黄豆大的直角圆弧与底层相通,第三层是透明玻璃,盒里装上十多个2毫米的钢滚珠——这些木磨机械加工的活在母亲看来,基本没有技术含量。60多年前她从学校出来,工作的第一站就是轻工业部上海设计院,从华东到西北,再到华中,一辈子和精密机械打交道,她尤其喜欢邱宁阿姨的艺术天分。第二层的五夹板

上,邱宁阿姨用蜡笔和颜料画出绿茵茵的草地,五六只活泼可爱的动物,有长鼻子的大象,淘气的猴子,威武的狮子,憨憨的小猪,每个动物的眼睛用细钻头打上孔,正好能让钢滚珠滑进去卡住。这个玩具很锻炼手的平衡控制能力,因为一不当心,滚珠就会滑到盒子边角的圆孔,掉到暗盒里。一拿到玩具,我就爱不释手,一玩能玩半天,但母亲坚决不让我带到学校去,她深知这个玩具的“威力”,怕“炸”校。校是没炸,小学毕业时,一群同学到我家玩,一看到这个玩具,倒是把我家“炸”了。

小时候,我家老家福建来人,总会带点燕皮,母亲每次做好福建菜肉燕,一定端上一碗,让我送到邱宁阿姨家,她知道邱宁阿姨喜欢美食。记得有一次,突降暴雨,邱宁阿姨家在一楼,窗外地面出现塌方,虽说是五层楼房,也吓死人,邱宁阿姨和九龄叔连夜跑回娘家,行前将家中贵重物品如现金、存折等等打成一个包袱,送到我家寄存。事后母亲提起来,总很感谢邱宁阿姨,我曾不解。

母亲告诉我,邱宁阿姨在危难时刻的这种信任,理应珍惜!

小时候初识邱宁阿姨,总觉得她有点特别。这种感觉,十多年前在金山寺门口,我又体验到了:那是接待早稻田的油勇教授,我南京外甥的博导,此前素未谋面。作陪的同事郑莹媛在日本生活过多年,日语八级,一眼就在如潮的人海中,认出池勇先生,用她的话说:气场如此。

稍长,我就此间问母亲,母亲笑笑:邱宁阿姨的妈妈是日本人,抗战胜利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称四野,我就从东北打到这里安家。

20年前,母亲所在大院拆迁,邻居们四散而去,很多人失联,我就再没有听到邱宁阿姨的消息。近两年母亲和哥哥相继离世,前不久回老家时我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找到邱宁阿姨的手机号码。

雨声滴答,空气中弥漫着樟树的清香,看着眼前的邱宁阿姨,我又仿佛回到当年春和景明的东湖湖畔,母亲与邱宁阿姨一起,带我挑荠菜踏青的时光。

关于吃肉的记忆

□ 张正

你笑呢!”那时,我多半盯着一碗油晃晃的红烧肉,咕咚咕咚在咽口水了。

除了过年过节,偶尔亲戚邻家有红白喜事,那时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放开肚皮大块吃肉,就是生产队死牛。牛老了病了会死,死了牛脏过节,家家可以分得几斤精肉,一连几顿撑得肚皮滚圆。可惜这样的机会不是太多,也不能太多。谁家小孩要是巴望天天吃牛肉,不挨大人耳刮子才怪。那年月,牛是生产队最珍贵的生产资料,耕田耙地全靠它们,农民对牛比老上人(长辈)用心,一年四季,有专人伺候。平日,人可以吃不饱,吃不好,牛除了吃青草、稻草,还必须添加豆饼、炒黄豆等精饲料。不奇怪,农耕时代,牛是种田

人最得力帮手,是饭碗。

小时候,我还吃过一回死猪肉。那是生产队长家的猪,不小心喝了腌咸菜的卤,毒死的。因为这件事,学生时代读《白毛女》剧本,我始终错误地认为,杨白劳自杀喝的,是同样的咸菜卤,许多年后才知道,腌咸菜的盐卤,和点豆腐的卤水,虽然都跟盐有关系,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生产队长家遭遇了大损失,结果让全生产队的社员“抬”损失算集体的,每家出一个人,晚上去队长家吃死猪肉。没有人觉得这是以权谋私。贫困年代,人们习惯了抱团生存,即使普通人遭遇不幸,可能也会这么做。大家都很开心,不是过节,不需要自己掏

一分钱,居然又可以吃肉管饱了。

一般人家,都是男劳力去,男劳力食量大,去了不亏;男劳力平常比较辛苦,应该去。我家这个名额,按理说应该母亲去——父亲在县城钢铁厂上班,平时母亲在家里外一把包,比父亲还要辛苦。可母亲没有去,她把名额让给了我。整整一头大肥猪,从猪头到下水,烧的烧,煨的煨,炒的炒,晚上一顿就被消灭光。我虽然喜欢吃肉,毕竟是十岁不到的孩子,比起那些身强体壮、长年肚里缺少荤腥的民工,还是吃得少得多。

第二天,有人笑母亲不会算账、划不来,母亲淡淡一笑,说:“我们吃不吃无所谓,孩子在长身体。”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肉。因为吃肉机会太少了,吃不够。农村人家,除了过年过节,平时哪会杀猪打肉?年底能杀猪的也是极少数人家,大多人家在腊月寒天买十来斤肉,腌腌刺刺就算过一个“肥年”。一年到头馋着的孩子,哪有不喜欢吃肉的?我肥的不嫌“滚”,瘦的不嫌卡牙,把肉当饭吃过过瘾。逢着和庄上人在一桌上吃肉,大人会逗我:“肥肉望